

# 中国当代文学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WENXUE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 卷）

修 订 本

王庆生 主编

国家教育部重点推荐高校中文专业教材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I:06.7

W35

1

国家教育部重点推荐  
高校中文专业教材

---

# 中国当代文学

---

修订本  
(上 卷)

主 编 王庆生  
副主编 王又平 李逸涛



A0914632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9 年·武汉

## (鄂)新登字 11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 上卷/王庆生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9

ISBN 7-5622-2016-6/I·146

I. 中… II. 王… III. 文学史—中国—当代—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8192 号

修订本

### 中国当代文学

(上 卷)

主 编 王庆生  
© 副主编 王又平 李逸涛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照排中心排版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电话:027-87876240)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责任编辑:王文戈  
责任校对:潘昌胜

封面设计:甘 英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1999年9月第1版  
印数:1—5000

印张:13.75 字数:366千字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1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 绪 言

在新中国成立的凯歌声中诞生的中国当代文学，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五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五十年来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是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文学，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变革，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既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续，又是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起点。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它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打破了神州大地的沉寂，揭开了我国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一翼的文学革命，在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下，随同历史的潮流一道前进。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飞跃。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则是我国革命文化先驱用血肉筑成的纪念碑。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革命文学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推动新文学运动走向一个新阶段。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两支文艺队伍会师，标志着我国当代文学的

伟大开端。至此，中国的新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定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为全国文艺运动的总方向。以后，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口号交替使用，并没有严格区分。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新的任务要求，使文艺服务的对象、范围和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社论，明确提出了由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组成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对象，要求文艺用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尽可能影响广泛的社会阶层，把全国人民动员到共同的伟大目标上去。这些正确的提法反映了已经变化的历史实际，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可惜的是，这篇社论发表不久，就被人为的阶级斗争的紧锣密鼓所淹没，尔后更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大加挞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认真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这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文艺的根本方向，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的必然发展。

五十年来，社会主义文学走过了一条坎坷的发展道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文化状况和文学特点，从大的方面来看，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从建国初期至70年代中期为一段，从70年代中期至今为另一段。这两个阶段的文学构成了

当代中国文学既曲折又辉煌的文学画卷。

从建国初期至 70 年代中期，是当代文学除旧布新、曲折发展的一个时期。建国初期，广大作家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满怀激情地熟悉新的生活，深入到工厂、农村、抗美援朝前线，为新的生活、新的时代歌唱，写下了礼赞祖国、礼赞党的颂歌：“在我们心脏的/炉火中/在我们血管的/激动里/燃烧着/沸腾着的/却有一个共同的/最珍贵的/元素/我们生命的/永恒的/活力——/这就是：/党”（贺敬之《放声歌唱》）。除了诗歌，还有一批表现时代强音的小说、散文和戏剧，这些作品虽然难免稚嫩、粗糙，但作为新中国文学的辉煌开篇，却是永垂青史的。继之，在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个兴盛的繁荣期，涌现出一批至今仍具魅力的长篇佳作，如《红旗谱》、《青春之歌》、《红日》、《林海雪原》、《创业史》、《红岩》、《三家巷》、《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野火春风斗古城》、《大波》、《李自成》等，这些作品（包括那些还未提及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戏剧），以其思想的深邃、艺术的精湛而载入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册。然而就在文学创作得到蓬勃发展的时候，党在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左”倾思潮的泛滥，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1951 年至 1955 年的对电影《武训传》，对俞平伯、胡适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1958 年的“大跃进”，1959 年的“反右倾”，以及接踵而来的文艺战线上的“反修防修”斗争，使“左”的倾向日益滋长，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陈毅的几次重要讲话和“文艺八条”的制定，曾使“左”的倾向有所纠正，文艺工作一度有所发展。但在这些正确的主张和措施尚未得到充分贯彻执行时，便又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一些代表人物的错误的、过火的批判，以致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9 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

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sup>①</sup>。林彪、江青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于1966年2月合伙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紧接着在全国推行了一条要从根本上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左”倾路线。在文艺界，他们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全盘否定“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诬蔑革命文艺路线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贬黜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以来的无产阶级文艺，禁止一切中外古典文学优秀遗产。在这“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十年里，万马齐喑，文苑萧瑟，黑白邪正被混淆，是非曲直被颠倒，文艺创作陷入了僵化和虚假的境地，艺术上日趋贫乏、单调和模式化，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然而，人民不会屈服，文艺工作者不会沉默。许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站在一起，在斗争中思索，于激愤中抗争，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形式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创造了人民的、战斗的革命文艺，给荒漠的文坛带来了新的曙光。特别是天安门诗歌运动，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预示着文艺的春天重新降临。

从70年代中期至今，是当代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通常被人们称为“新时期”。这一阶段以1976年10月中国人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契机，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新时期伊始，文艺界主要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与此同时，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不可遏止的热情，创作了一批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揭批“四人帮”的作品，提出并回答了千百万人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再现了十年动

---

<sup>①</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1页。

乱期间的悲壮图景，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两个凡是”的束缚，文艺的发展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1978年思想界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自此掀起了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此基础上，党中央于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根本上结束了延续多年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此后，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下，思想解放的洪流冲开了多年来禁锢的闸门，冲击着个人崇拜、教条主义和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荡涤着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污垢，出现了文艺的复兴。不论在创作的数量还是质量上，也不论在主题的深刻性还是题材风格的多样性上，都是过去难以比拟的。仅以长篇小说为例，“文革”前的最高实绩是1959年的32部，而现在每年出版的平均达800部。当然数字只能说明一部分问题，重要的是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和突破。自此以后，社会主义文学走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迎来了一个姹紫嫣红、繁花似锦的繁荣时代。

## 二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尽管有过多次的曲折和反复，但从总体来看，当代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单一到多元、从直露到深邃、从封闭到开放的路程，它所发生的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取得的成就是引人瞩目的。

当代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描写的生活范围和创作领域不断扩大。“五四”以来，我们曾经创作了许多以农民、知识分子、小市民生活为题

材的作品，这些作品表现了人生的不幸，家庭的风波，社会的动乱，人民的觉醒，描绘出一幅幅民主革命历史时期的生活画卷。解放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文艺创作开辟了广阔道路。从农村到工厂，从部队到学校，从边陲到城市，从现代到古代，从地上到天上，都囊括在作家的视野之中。不仅描写革命战争和农村生活的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和成就，而且过去涉猎甚少的或者完全没有涉及的工业题材、少数民族生活题材、老一辈革命家题材、国际斗争题材以及历史题材、科学幻想题材等，都有了长足发展，填补了文学创作的某些空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题材的禁区被打破，不仅当代沸腾的社会生活有了更加广泛的反映，而且那些未被开垦的生活处女地也得到开掘。如，描写知识分子在西北农场劳动改造的《绿化树》（张贤亮），表现传统文化观念和心理变革的《古船》（张炜）、《狗儿爷涅槃》（锦云）、《河魂》（矫健），描写“善吃”的资本家的《美食家》（陆文夫），揭示僧人生活的《受戒》（汪曾祺），反映青少年犯罪生活和新的追求的《寻找回来的世界》（柯岩），揭开监狱生活一角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等，都为人们认识繁复的社会生活和各类人物提供了多姿多彩的画面。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山川、乡土、风情、历史、人物，都在当代文学的画卷中得到反映。

第二，文学的主题从单一转向丰富，从直露转向深邃。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作品，主题比较单一狭窄，为了配合中心，为政治服务，有些作品的主题摆脱不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新时期以来，作品的主题丰富多样，作品的意蕴进一步深化。作家们“已经不满足于从社会思想潮流的表面汲取一般化的概念作为自己作品的主题，而是把自己的思想触角，深入到自己熟悉并且受到深深感动的生活素材中去，深入到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去，力求获得与生活血肉相联的独特的思想发现，在这个基础上

提炼主题”<sup>①</sup>。这样从生活中提炼的、经过作家强化的主题，既非单一的歌颂，也非单一的暴露；既非政策的形象图解，也非千篇一律的模式，而是表现了作家对时代、对生活、对人生的独特的思索和理解，融进了自己的审美意识。与五六十年代相比，新时期文学的主题呈现出进一步深化的趋向。这不仅表现在同一题材在“文化大革命”前后提炼的主题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表现在新时期文学作品中同一题材的作品题旨的迥异。就“文革”前后的同类题材作品而言，《西线无战事》（徐怀中）、《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和《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三千里江山》（杨朔）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不同的时代特点，而前者显得更为丰富、深刻，作家对当代军人精神世界的揭示，不再是单一的歌颂，而是奏出了融颂歌、战歌、悲歌和挽歌于一体的浑厚、优美的交响乐章。新时期的不同作家描写同一题材，主题的表现也有很大不同。描写改革，蒋子龙和张洁笔下的题旨迥然有异，描写女性的《月食》（李国文）、《流逝》（王安忆）、《心祭》（宗璞）、《普通女工》（孔捷生），在主题的开掘上也各有自己的发现。有些作品的主题，也非单向涵义所能概括，往往形成模糊多义的统一。如《老井》（郑义）不仅仅是写一群农民为摆脱穷困而世代打井不止的故事，它的深层意义还在于说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历史的和现实的文化心理形态，以及在变革时代发生的曲折而又可喜的变化。《野人》（高行健）描写的也不只是对古代文化的寻根，而是在维护生态平衡的呐喊中揭示文明同野蛮、开化同愚昧的冲突。新时期文学作品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说明文学对时代、对生活的反映已经跨向一个新的高度。

由于主题的扩大，作家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有新的突破。以往有些作品对人物性格的描写，局限于表

---

<sup>①</sup> 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人民文学》1985年第1期。

层，形成了好人一切皆好、坏人统统都坏的格局。人物独特的个性，性格的丰富性，都消融、散失在类型之中、模式之中。新时期以来，作家们把艺术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多方面地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矛盾性和复杂性。不论是写英雄人物还是普通人，是写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一改过去那种从抽象的概念或理念出发的做法，像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那样，使人物性格成为鲜明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多种色彩的有机体，从而呈现出较为深厚的意蕴。比如在描写改革题材的《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花园街五号》（李国文）、《改革者》（张锲）、《乡场上》（何士光）中，作者既写出了改革者摆脱精神羁绊之后所展示的勇于冲刺、勇于挑战的锐气与活力，也写出了他们在改革中的困惑与不安，以及他们在复杂的同事关系、亲友关系、夫妻关系之中的矛盾纠葛。在《将军吟》、《高山下的花环》等作品中，既写出了高级将领和普通一兵的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品格，也揭示了他们在动乱中一时出现的善良与怯弱、理智与屈从的复杂心态。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文学中还出现了一批性格复杂的形象，如商人田玉堂（方之《内奸》）、战士郭中（莫应丰《将军吟》）、医生安适之（苏叔阳《故土》）、学者倪吾诚（王蒙《活动变人形》）等。对这些人物，作者不取外在表现，而是着力写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因素的矛盾和统一，从而真实地揭示出内心世界的隐秘。这对那种所谓“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理论程式显然是一种否定和突破。对反面人物的描写也一改过去常见的脸谱化，通过对人物灵魂的深刻剖析，写出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人物的本来面目。

第三，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有了新的突破。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个民族的文学、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显示了一个时代文学的繁荣。早在 30 年代，毛泽东就要求文学艺术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

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①</sup>。解放以后，虽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风格、艺术形式的发展，但是，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深入生活，坚持艺术探求，在现代化、民族化的基础上创造个人风格，仍然取得了显著成就。有些早在“五四”以来就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思想、艺术水平的提高，创作个性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些作家则是在建国以后通过不断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许多作家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更是不断探索并创造多种艺术风格和艺术形式，用以反映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

茅盾说：“我们的和时代一同前进的作家，尽管各有各的风格，然而在他的个人风格上，一定有时代精神的烙印。”<sup>②</sup> 一个作家风格的形成有多种因素，时代的、社会的影响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了一批倾向相似、风格相近的作家群，如人们熟知的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以孙犁为代表的河北作家群，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以及五六十年代南京出现的剧作家群，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组成的“探索者”作家群，在边疆地区出现的描写少数民族和边疆斗争生活的云南作家群等。8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邓友梅、刘绍棠等的京味小说家群，贾平凹、路遥、陈忠实等的秦晋作家群，冯骥才、林希等的津味小说家群等，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家或作家群体的出现，与一个时代、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区的社会风尚、文艺风尚，以及这些地区对文艺人才的发现、培养等，有

---

①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01页。

②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争取社会主义文学的更大繁荣》，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

着密切的关系。它是融会了个人艺术创造的时代产物，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一种文学现象。

就创作方法而言，五十年来所经历的变化也是十分深刻的。建国以来，我们倡导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等创作方法，使革命现实主义处于独尊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除继续坚持现实主义外，各种艺术流派、各种创作方法纷至沓来，文学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也发生了嬗变。一些作家在主体同客体的关系上，由重点描写客体转向注重主体意识的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展示上，由外部表象转向内心世界的开掘；在情节结构上，由注重传统的故事和结构模式转向情节的淡化和多样化；在环境的描绘上，由静止转向流动。这些变化遍及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而在小说作品中最为明显、突出。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系列小说《“新大陆人”》等，就是这些方面的力作。在《活动变人形》中，作者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出了现实的荒谬，尽管叙述视角、叙述手法多变，人物的根基却仍然深深扎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之中，溶化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之中。刘心武在长篇小说《钟鼓楼》中虽然承继了自己一贯的创作特点，但在结构和叙述方式上，在人物和场面的描绘上，都有许多新的变化。全书没有一条单一的、明显的情节线索，也没有一两个统领全局的主要人物，而以一座四合院的九户人家为中心，反映了近四十个人物的经历、命运和他们之间的纠葛、矛盾，多层次、多侧面地写出了人物性格发展的历史，从而展示了一幅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社会主义文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尽管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仍占主导地位，但是看来不必、也不可能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定为一尊。正是由于其他创作方法对现实主义的影响和挑战，使当代文学的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法有了新的变化。这大体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在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吸收了现代

主义的艺术手法和表现技巧。如运用象征、通感、意象等手法反映生活，使诗的意境显得朦胧、深远；使用“意识流”手法表现人的潜意识，增大作品的容量，更好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采用变形、象征等手法，突破戏剧舞台“第四堵墙”的限制，扩展戏剧表现的领域。这样的吸取、运用，大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第二种是以现代主义创作方法为主，运用表现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和荒诞、变形、“黑色幽默”等手法反映社会生活，开拓了作家的视野和艺术表现空间。宗璞的《我是谁？》、谌容的《减去十岁》、郑义的《老井》和《远村》、莫言的《红高粱》、陈建功的《髻毛》、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高行健的《车站》和《野人》，以及舒婷、江河、顾城的朦胧诗等，都大胆地使用了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在不同程度上显出了新意。尽管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作家们的革新意识无疑给新时期文学增添了新的色彩。第三种是恪守传统、发展传统，从中国的传统美学中汲取营养，力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风格。有些作家一方面把自己的“根”伸向历史深处，另一方面又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最敏感的地区，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去描绘自己熟悉的地区的乡土习俗、人情世态，创作出一幅幅令人赏心悦目的时代风俗画。如古华将传统同现实结合，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刘绍棠通过京东风情的描绘，表现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汪曾祺明确提出了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的口号，他的作品明显地留有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的印记。种种情况说明，创作方法的嬗变，打破了长期固有的服从一种规范、崇尚一种价值、恪守一种艺术模式的一统化格局，使当代中国文学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的强化。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在建国十七年中遭到了同现实主义类似的厄运，或受冷落，或被歪曲、庸俗化。新时期以来，在有些作家的作品中浪漫主义表现得十分活跃。张承志展示的茫茫草原、奔驰

骏马，王安忆精心构造的小鲍庄世界，贾平凹眼中的商州风土人情，郑万隆描绘的异乡异闻，梁晓声再现的北大荒暴风雪，邓刚颂赞的大海和渔民，无不弥漫着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些作品中的传奇的故事、强烈的抒情、奇特的幻想、大胆的夸张、隐秘的象征，体现了作者重主观、重理想、重自我、重表现的美学追求。它既展现了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又揭示了各种人物生存与抗争、爱与恨、拼搏与依恋的心灵历程。浪漫主义的张扬，也为当代文学增添了绚丽色彩。

总的说来，现实主义和其他创作方法、表现手法的交互运用，形成了过去少有的多种流派、多种方法并存、并争、并荣的局面，从而使当代中国文学具有多种色彩，多种音响，多种风格。

第四，少数民族文学恢复了生机。我国有 56 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个民族创造了大量多姿多彩、风格独具的文艺作品，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但在解放前，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受到歧视和摧残，不仅得不到发展，有的民族文学还濒于泯灭的边缘。建国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照耀下，少数民族文学获得新生，涌现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创作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如《欢笑的金沙江》、《瀑布》、《幸存的人》、《茫茫的草原》、《正红旗下》、《醉乡》、《狂欢之歌》、《幸福与友谊》、《铁忙牛》、《生命的礼花》、《望夫云》、《格桑梅朵》、《没有织完的筒裙》、《草原集》等，整理加工了一批民族民间文学佳作，如《阿诗玛》、《百鸟衣》、《嘎达梅林》、《江格尔》、《召树屯》、《格萨尔王传》、《娥并与桑洛》、《玛纳斯》等。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少数民族苦难的昨天和幸福的今天，形象地展现了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风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以及本民族地区奇伟、壮丽的自然风光，为人们描绘了包括历史生活和现实生活，也包括各种神话世界在内的动人艺术画卷。少数民族文学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是这些民族历史上所未有的，也是我国文学史上

所未有的。

第五，形成了一支经受严酷考验，能够勇敢战斗的文艺队伍。早在20年代，鲁迅就殷切期望中国能够出现几员闯将，打破文坛的沉寂，建设新的文艺。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经采取措施培养青年作家，并把大目标一致而又持有不同观点的作家团结在一起，共同作战。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我国产生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和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曹禺等一批杰出的作家。解放以后，作家们经受了多次风雨的磨炼，但斗争的风雨没有把作家压垮，正如茅盾所说：“皮鞭和枷锁，凌辱和迫害没有摧垮我们，反而把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更加成熟。”<sup>①</sup>经过半个世纪的锻炼和考验，一支富有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文艺大军已经形成。据统计，“文革”前的1966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为1059人，现在已超过3000人，至于作协分会的会员已经超过万人。这支队伍大体由四部分构成：一是“五四”时期投入新文化运动的老一辈作家，他们是“五四”时代的产儿，曾为创建新文学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又为当代文学谱写了新的光辉篇章。二是在我国民主革命的不同历史时期中为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的作家，其中有在腥风血雨的大革命时期和30年代出现的，也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崛起的。他们曾担负着承上启下的重任，成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顶梁柱。三是新中国诞生后崭露头角的作家，他们之中有的是在三四十年代参加革命而在建国后显示文学才华的，有的是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之中的不少人曾在“反右”扩大化中或在“文革”中受到打击和诬害，但他们挚爱人民的心未曾泯灭。粉碎“四人帮”后，他们从艰苦的生活磨炼中激起创作热情，使自己原来亲历过、感受过的生活与新时期的时代气息产

---

<sup>①</sup>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生联系和呼应，因此从新时期一开始就取得了蓄久发速、佳作迭出的成果。还有一批是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中涌现出来的，他们带着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走进了当代文坛，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中坚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批从事领导工作的干部（如省长、省委书记、市长等）也拿起笔从事创作，写出了长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四是在新时期相继涌现的一大批青年作家。这批新人或者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或者出生于六七十年代，尽管他们开始的创作往往比较稚嫩，先天还有某些不足，但如同鲁迅针对当年的青年文艺家说的，“希望就正在这一面”，他们“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sup>①</sup>，是生气勃勃的富有生命力的一代。其中，一批女作家的出现，更是历史上少见的。她们的成批涌现，使社会主义文学长河腾起了活泼的细浪。由上述几部分作家汇合组成的作家队伍，特别是中青年作家正在当代中国文苑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创作环境的优化，作家创作主体的解放，大大解放了文学艺术生产力。新时期以来，不论是老一辈作家还是中青年作家，都以不可抑止的激情谱写出独具艺术个性和特色的篇章。老作家巴金精神焕发，老而弥坚，在古稀之年顽强写成集《随想录》，实现了“写自己所想写的”夙愿，为新时期文学树立了丰碑。王蒙虽历经坎坷，但获得平反以后就以人们未曾料及的速度恢复和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分显示出深厚的内在活力。他不仅写得多，而且能够顺应社会变革的进程，着时代之先鞭，促文澜之大涌。贾平凹的创作能力释放后，不仅产量很高，而且风格独具，写出了《浮躁》、《鸡窝洼的人家》、《高老庄》等佳作。正如老作家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说的，他“是有根据地，有生活基础的。是有恒产，也有恒心的。他不靠改编中国的文章，

---

<sup>①</sup> 鲁迅：《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4页。